



北京雍和宫是清朝乾隆、雍正两代帝王的“在潜之居”，后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备受清朝中央政府重视，以“尊国政、谕例律、知举止”为宗旨，成为中原地区联结青藏高原、蒙古草原的一条宗教纽带，成为满、汉、藏、蒙古等兄弟民族之间交流的一座桥梁。历代达赖、班禅、章嘉等活佛大师，在此留下了他们爱国爱教、维护中华一统的千秋佳话。而雍和宫所藏佛像，在这一历史时期，有的是清代帝王的宗教活动所用；有的是蒙古、西藏及内地高僧大德往来酬谢之馈赠；有的是皇帝给予寺院高僧的颁赐；还有的是西藏上层人士、历代达赖、班禅进献给皇帝和雍和宫的贡品、礼品。它们是雍和宫文物宝库中独具魅力的珍宝，融藏地、汉地及宫廷造像艺术特点和制作技术于一炉，弥足珍贵，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和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更是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亲密关系的象征。本刊特约请雍和宫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立祥先生撰写此文，以飨读者。——编者按

雍和宫位于紫禁城的东北方，东邻古刹柏林寺，西与元代太学国子监相望，北邻地坛公园，是北京保存完好的著名古代建筑群。历史上，雍和宫曾是清代雍正和乾隆两代帝王的在潜之居，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皇帝行宫。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藏传佛教寺院。

改寺初始，乾隆即颁旨，寺院内设显、密、时轮、医学四大札仓（学校），各札仓的堪布（校长）由西藏各大寺院选派，僧员由内、外蒙古选送。在雍和宫的藏品中，许多都是16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士、高僧大德进献给皇室和本寺的珍贵礼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乾隆十年（1745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和七世达赖喇嘛商定，为雍和宫改庙尊旨进贡，其中有铜鎏金释迦牟尼佛说法像，白檀木三叶冠观世音菩萨像。乾隆十三年（1748年），七世达赖喇嘛又从尼泊尔购得一棵巨大的白檀木，历经三载运至雍和宫，由皇宫养心殿造办处施工，雕得18米高的弥勒

乾隆与雍和宫 藏传佛教文物

文、画、摄影—李立祥

大佛，成为雍和宫木雕三绝之一。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世达赖喇嘛又送来佛本生记唐卡41幅。这些贡品工艺精湛，是雍和宫所藏文物中的精品，至今完好。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命清宫造办处制做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拉萨，用以掣定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另一个供于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此瓶曾为十数位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认定。当时，雍和宫成了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是藏、蒙古等地区高僧大德向往之地。

两尊带款佛像

在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第二年，即乾隆十年（1745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特从西藏为雍和宫敬献了两尊精美佛像。

释迦牟尼佛说法像 此像身高40厘米，铜质，铜台座，下置木质须弥座，后有木质背光，通高110厘米。佛像头饰螺发，肉髻凸现，面部双眉高挑，眉



交钦差副都统索拜恭请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宫掌教转轮结印释迦牟尼佛。此系释迦牟尼佛在西域文严城室罗筏城灵鹫山三处转法轮之像源流经云凡供此佛之处法教大兴。”紧靠此款为乾隆御制赞诗：“佛身普遍诸大会，充满法界无穷尽，为救世间而现身，究竟本无身可现。如妙莲花出诸水，水与莲花无二性，是则名为转法轮，西天东土何分别。”

观世音菩萨立像 此像系白檀木雕刻，101厘米，头戴三叶冠，表情文静典雅，双耳下缀耳饰，肩较宽。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胯部斜缠帛带，左手置于胯，右手下垂，掌心向外，结施与印。此像身姿优美，细蜂腰，身体向左侧稍倾，呈活泼轻快之感，其下为椭圆形覆莲座。具有中世纪印度尼泊尔造像的遗风。

间饰白毫，鼻梁挺直，双唇微合。右肩袒露，锦帛斜披至腋下，胸部丰满，衣纹呈水波状。双手端置于胸前，以大拇指和食指结为环形，作说法印。佛像的铜质台座做工精美，上为鳌饰生灵的座垫，下为连环纹等图案。莲瓣组合的立柱撑于四角，镂空透雕，中为金刚力士，两旁为金翅鸟，两只狮子各踞一方。其台座左右各有一铜质鎏金侍人，跪状。此座之下为一层木质贴金莲花台座。背光为木质漆金，满饰镂空雕刻，外为祥云卷草图案，中有七佛环绕，内圈为明镜，整个背光雕琢工细、华美。

背光后面自右至左依次刻有汉、藏、满、蒙古四种文字款识，为正书，四种文字内容一致，其中汉文款曰：“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奉特旨，命西藏郡王颇罗鼐将有利益佛像请至京城供奉，颇罗鼐随与达赖喇嘛公同阅定，

此像的须弥座为楠木，中部束腰。背光呈莲瓣形，中刻“六拏具”，为藏传佛教木雕、铜鎏佛像背光上经常表现的动物图案：顶部为大鹏金翅鸟，其下两侧对称刻有龙女，表救度之相；摩羯鱼，表护卫之相；童子骑马，表资福之相；狮子，表自在之相；大象，表善师之相。此背花纹饰凸显，造型圆厚。

背光后自右至左依次刻有汉、藏、满、蒙古文字款识，为正书，四种文字内容一致。汉文款同曰：“西藏郡王颇罗鼐恭庆曼殊室利大皇帝为众生安逸，大兴黄教建立新庙，敬进白檀庄严利益罗吉硕哩佛，交伊来使囊素丹津颜品尔口口于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宫。番称鉴赖滋克，蒙古称尼都伯尔悟哲克齐，华称观音菩萨。”

木雕弥勒大佛

此大佛在万福阁内，此阁是雍和宫最为宏伟的建筑，高23米，飞檐三

重，列拱交构。左右有配阁，并以飞廊相连，宛若瑶台琼阁。供奉于阁内的木雕弥勒大佛，其中心是由一根完整的白檀木雕刻而成，地面以上高18米，地下埋有8米，巍然矗立在汉白玉须弥座上，其头部直顶最上层阁楼的藻井。据说，当年给佛像做一件大袍就用去黄缎1100米，万福阁也由此得名“大佛楼”。

此阁建于清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间(1748年-1749年)。相传在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时，并未建万福阁，这里只是一座观音殿，殿内供奉着观音菩萨像，背景是木制山峦。改为寺院后，乾隆皇帝觉得寺



院的北面太空旷,欲建一座高大楼阁,为北面的屏障。但一直苦于没有一尊与之相称的大佛像。此消息被西藏贡使带回,当第七世达赖喇嘛得知后,立既派人搜寻大佛造像的原料。恰在此时,尼泊尔王国从印度运回一根高大的白檀木,达赖喇嘛闻讯后,既以大量珍宝购得,并由西藏经四川走水路,历时三载运至京城。

檀木到京后,乾隆皇帝命察罕达尔罕活佛指挥设计,并由皇宫养心殿造办处的“广木作”、“木作”、“漆作”、“雕漆作”等在雍和宫负责施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的满文文献载:雍和宫的万福阁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二十日,将京城景山内的楼阁拆了之后,在景山北面的围墙打开了一个豁口,如此连木带石经这豁口一车车运至雍和宫。这年十二月开始组装楼阁并雕刻大佛。经辛勤劳作,圆满完工,故万福阁是从景山移建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三十日,雍和宫举行了万福阁落成和弥勒大佛开光大典。而昔年民间所传的“先有大佛,后有万福阁”之说不甚准确。当时,此工程及附属建筑先后从国库支出八万多两白银,赤金八百余两。

大佛之名“弥勒”是梵文的音译,姓“慈氏”,名“阿逸多”。藏语称“强巴”,蒙古语称“迈达拉”。“弥勒上生经”上说:弥勒出生在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随释迦牟尼出家,修习佛法,成为佛弟子。他在释迦牟尼圆寂前先行离世。释迦牟尼曾预言,弥勒离开世间后,将上生兜率天宫,在那儿与诸天演说佛法。弥勒造像由此分为菩萨装和佛装两种,雍和宫木雕大佛为菩萨装弥勒像。这尊大佛的面部庄严肃穆,头戴五佛冠,其微垂的双目、紧闭的嘴唇,给人以万般慈祥之感。佛身挂遍璎珞,其左右肩上各有一花篮,篮内之花含苞欲放,花之上有法物,左肩为净瓶,右肩为法轮。双手做“扶天盖地”式,象征着弥勒继承

释迦牟尼佛在未来世界讲经说法,普度众生。此大佛身上曾挂有一串周长12米的上等料器佛珠称“宝石官料大佛珠”,每粒珠子直径计有10厘米,为清乾隆年制,现藏于寺内。

大佛的胸部正当楼阁的二层,面部在楼阁的三层之上。1990年8月,这尊大佛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1992年,这尊大佛进行修缮并重新贴金,耗资50万元人民币。1993年10月,雍和宫举行了隆重的弥勒大佛开光庆典。2005年3月,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亚洲部主任霍堪·沃尔斯特先生应邀到雍和宫访问,当他参加完英文版《雍和宫》第一册授权签字仪式后,登上了他盼望已久的万福阁楼上,凭栏远望,不禁感慨地说:“当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先生来到雍和宫只在万福阁楼下瞻望良久,并拍了照,但他没有登上楼上,而我实现了这一愿望,我感到很幸运。”

佛本生传如意宝树唐卡

在藏族传统艺术中,唐卡艺术堪称一绝。唐卡又作唐喀,是藏语音译,其本意有二:一指平坦,二指政府诏令,后专指以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卷轴画。唐卡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成熟于宋元,盛于明清,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为藏文化中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

雍和宫所藏唐卡多为清中期的作品,而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唐卡艺术发展中最辉煌的时期。做为唐卡,由于便于悬挂、收藏和弘传佛法,故在当时清中央与藏、蒙古等地区高僧大德的酬谢答送中,不断带入雍和宫,故其精品众多。其中,“佛本生传如意宝树”布本彩绘唐卡,计41幅,每幅长112厘米,宽78厘米。此唐卡系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七世达赖喇嘛所送。据



《章嘉传》载:当年,七世达赖喇嘛为恭贺雍和宫改建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特赠送给皇帝一组依其授意专门绘制的“佛祖本生传如意宝树唐卡”,并在第一幅背面亲书贺词。当这组唐卡和一些佛像、佛经、佛塔等供养物一起呈送给乾隆皇帝时,皇帝非常高兴,并发愿让达赖喇嘛送来的这些礼品给佛教及众生带来福德。之后,乾隆皇帝将唐卡拿起细看,正好看到写有贺词的佛像,喜悦异常。

“佛本生传如意宝树”唐卡中描绘的是佛祖在过去生还是菩萨时教化众生的种种事迹,这一故事是佛教美术中司空见惯的题材,在敦煌壁画和藏区唐卡中多有表现,依其内容可分为四类。一以宣扬忍辱施舍为主题,如舍身饲虎、割肉冒鸽等;一以宣扬仁智、信义为主题,如九色鹿等;一以宣扬孝悌为主题,如善太子、猴王救母等;一以宣扬闻法、持戒为主题,如大光明

王、瞿楼婆王等。雍和宫这组唐卡,除了有以上某些内容外,还有描绘佛祖成道前入胎、出生、太子习文练武的场景。在每幅唐卡的上端,绘有七世达赖喇嘛像,据说佛的本生故事,是七世达赖喇嘛亲自讲授给弟子们听的,故画师在作画时,特意将其绘于上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雍和宫这组唐卡有其独创性,画师没有简单描摹以前的粉本,而是赋予了个人的感悟,并以其高超的技艺表现出来,感化众生。

这组唐卡中主尊的造型很美,佛祖下垂的细眉,微启下视的双目,修长端直的鼻梁,圆润的双颊,微锁的嘴唇,含而不露的笑容很符合经书中对于唐卡绘制的要求:“眉毛好似弯弓状”,“眼睛好像竹弓般”,“手掌要像红莲花”,“脚背‘好像龟背拱起状’等等。在用线方面汲取了工笔白描风格,近乎“高古游丝描”,衣着丝带,珠光饰物画的一丝不苟,可谓炉火纯青。在每幅的背景中,人物安排的疏密得当,殿宇错落有致,山石、花草、树木的细节处理十分生动。同时,每组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得到了高度的发挥,根据情节有机地组成一幅幅生动有趣的传奇故事画。多年以来,对于这组唐卡在排列顺序及每幅的内容、称谓上说法不一。近年,经雍和宫住持嘉木扬·图布丹潜心研究,重新依序排列,并译出每一情节的名称和部分内容,又以诗歌体形式写出。比如在“舍身饲虎”这一情节中写道:“依深岩处专注寂静法乐时,观虎腹肌难忍泪下如珠串;母虎难耐舍爱张牙欲吃子,佛子不忍舍身饲虎堪称奇。”语言简炼、内涵深广。

金瓶与喇嘛说

西藏大昭寺与北京雍和宫内各珍藏着一件同时制做的金瓶。此二瓶系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之下设计制做的,其中一件颁于西藏大昭寺,一件颁于北京雍和宫。此金瓶又称:“金贡巴瓶”,“贡巴”既藏语“瓶”的译音,系藏传佛教的

重要供器。

关于颁发金瓶的缘由,还要追溯到当年清政府派大军入藏,平定廓尔喀入侵后,为割除吹忠降神妄指活佛转世灵童之弊,规定此后达赖、班禅以及章嘉、阿嘉、洞阔尔等大活佛转世灵童需在大昭寺、雍和宫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即“转世尊者”,又称“珠必古”、“阿拉”、“仁波切”,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活佛转世制度取得藏传佛教的崇高地位,在广大信众中享有至尊的地位。其中“珠必古”为“化身”意,指有成就的正觉者圆寂后的“化身”,即“转世活佛”。“阿拉”为活佛的别称、尊称。表示对活佛的尊敬,此词蕴含着引领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意。“仁波切”意为宝贝,亦为活佛的尊称,是藏族信众对活佛最



为常用的称呼。关于金瓶,在雍和宫内的乾隆御制《喇嘛说》碑文中讲得十分清楚。此碑以满、汉、藏、蒙古四种文字雕刻,南面为满文,北为汉文,西为藏文,东为蒙古文。汉文有693字,另有夹注小字1489字,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针对当时在活佛转世制度执行中产生的“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的严重弊端而撰写的。文中指出“近日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又云“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转世,令于雍和宫之金瓶内掣签。”其目的在于“整治流弊”,以“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即规定:今后遇到寻访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之上,放进瓶内,选拔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掣定。从此,金瓶掣签制度成为乾隆末年以后认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法定程序,即使有转世灵童免于掣签,也必须先报中央政府,经中央派员审查批准后方能有效。二百多年来,这一制度已经成为必须遵行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

此二金瓶腹上部为一圈如意云头图案,中部篆刻“十相自在图”。此图由七个梵文字母和三个图形组成,又名“十轮金刚咒”,藏语称“朗久旺丹”是修习藏传佛教密宗时轮金刚本尊大法时所持的咒语。金瓶的瓶座与瓶盖饰云头、海水、如意宝珠、缠枝莲图案,瓶盖顶部嵌白玉一颗,其下嵌松石、珊瑚、青金石等。金瓶外包五色绸缎缝制的瓶衣,另有象牙牌五支,系掣签前书写灵童名字之用。此瓶系以皇宫内库六成金八十两制做,其造型取材于皇宫内藏草瓶样式而略加改制,并于当年交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内供奉。